

马大勇

著

现代诗词论丛
XIANDEI SHICI LUNCONG

晚清民国词史稿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中华诗词研究院资助出版

本书为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百年词史研究”（10CZW035）阶段性成果
吉林大学青年学术领袖培育计划（2015FRLX02）



本书由中华诗词研究院资助出版

詩詞

马大勇

著

现代诗词论丛

XIANDAI SHICI LUNCONG

晚清民国词史稿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民国词史稿/马大勇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2
(现代诗词论丛)

ISBN 978-7-5622-7256-4

I. ①晚… II. ①马… III. ①词(文学)—词曲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②词(文学)—词曲史—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6228 号

晚清民国词史稿

◎ 马大勇 著

责任编辑:张怀东 古沁	责任校对:肖绪旭	封面设计:胡 灿
编辑室:中华诗词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737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280/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字数:590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41	
版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定价:92.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出版说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新文学的兴起，传统文学样式被称为“旧体”，为主流文学史叙述所贬抑、排斥。承续中国传统文学主要样式的现当代诗词，也长期被置诸学术研究和文学史叙述的视野之外。于是，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的百年诗歌史，被简化为一部新诗发展史。事实上，传统诗词创作像新诗一样是个庞大的存在，现当代诗词缺席的诗歌史，不是完整的现当代诗歌史。

目前，当代诗词正处于一个由复苏逐渐走向繁荣的新时期，诗词创作队伍空前庞大，诗词组织星罗棋布，诗词刊物争奇斗艳，诗词作品汗牛充栋，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是，诗词评论稍显岑寂，现当代诗词研究与理论建设步履维艰，难以与蓬勃发展的诗词创作产生良性互动。近十多年来，这种局面才稍稍有所改变，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了一批现当代诗词研究项目，部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也开始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现当代诗词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陆续出现了部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中心把目光投向当代诗词评论与研究领域，致力于该类著作的出版，并获得广西桂平太平文化发展研究基金资助，成功推出了现当代诗词研究的第一套系列丛书“太平基金文库·诗词论丛”，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在此基础上，本中心继续推出“现代诗词论丛”。本论丛精选有分量的现当代诗词研究著作，先期四种包括陈友康《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刘士林《诗性文化的旧邦新命》、马大勇《晚清民国词史稿》、黄阿莎《沈祖棻词作与词学研究》。国务院参事室中华诗词研究院作为国家级研究机构，自成立以来，为推动当代诗词传承与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此四种现当代诗词研究著作即由该院资助出版。我们将以此为基础，继续致力于此项出版工作，为推动当代诗词创作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相信集腋成裘，必有可观。

中华诗词出版中心

2015年12月

绪论 行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

- 关于二十世纪词史的若干问题····· 001

第一编 古典词史的“花间晚照”：清民之际(1900—1920)词坛研究

第一章 《庚子秋词》与《春蛰吟》····· 063

- 第一节 “留得悲秋残影在”：论《庚子秋词》····· 063

- 第二节 漆室之叹与曲江之悲：论《春蛰吟》····· 078

- 第三节 “庚春词人群”扫描····· 085

第二章 “晚清四大家”平议····· 092

- 第一节 “晚清四大家”并称由来、基本定位与理论祈向····· 092

- 第二节 “直逼稼轩”的半塘词 附王以敏、裴维佺····· 104

- 第三节 “以词托命”的郑大鹤 附陈锐、张尔田····· 117

- 第四节 “涩”与“重”：论彊村词 附夏孙桐、陈洵、陈曾寿、“粤两生”
····· 127

- 第五节 哀艳与性灵：论蕙风词 附赵尊岳、陈运彰····· 148

- 第六节 余论：关于清遗民····· 159

第三章 “兀傲拔戟”的文廷式与“偶开天眼”的王国维····· 162

- 第一节 “兀傲拔戟”的文廷式

- 兼谈清民之际“稼轩风”····· 162

- 第二节 “偶开天眼”的王国维

- 兼谈“哲理词”之流变····· 180

第四章	群星丽天的清末民初词坛·····	195
第一节	被双重遮蔽的大家：论易顺鼎词 附易顺豫、程颂万、樊增祥、 杨圻·····	195
第二节	清民之际词坛的地域观照（上）江苏、浙江词坛·····	222
第三节	清民之际词坛的地域观照（下）福建、四川词坛·····	236

第二编 “亦狂亦侠亦温文”：南社词研究

第一章	论南社情志派词·····	260
第一节	“寸心万古情魔宅”：论黄人词 附周实、宁调元、杨铨 ·····	260
第二节	“灵气胸中未已”：论柳亚子词 附金天羽、陈去病、高旭、高燮、 高增·····	272
第三节	“诗狂”林庚白与“湖湘巨子”傅尊 附刘鹏年·····	287
第四节	情志派余论：李叔同、胡怀琛、王钟麒、陈蜕、叶楚伦 ·····	296
第二章	论南社格律派词·····	303
第一节	“箫愁剑恨满词笺”：论庞树柏词 附蔡守、叶玉森、寿筮、易孺 ·····	303
第二节	南社学人格律词双璧：陈匪石与邵瑞彭 附陆峤南、胡先骕 ·····	317
第三章	论南社情格兼重派词·····	335
第一节	面目漫漶的大手笔吴眉孙·····	335
第二节	“词章名手”王蕴章与“信口而歌”的姚鹓雏 附郑泽、程善之、 顾无咎·····	344
第三节	“投荒万里一词人”：论张素词 附俞樾、陶牧、胡颖之、姜胎石、 姜可生·····	356
第四节	“南社老名士词群”：沈宗畸、潘飞声、杨锡章、徐珂 ·····	373



第三编 以学人为主干的民国中后期(1920—1949)词坛

第一章 曲学大师吴梅与朴学大师黄侃·····	388
第一节 “无路诉相思，霜灯梦入壶天”：论吴梅词 附谈其散曲、卢前 ·····	388
第二节 “情深文跌宕，气迈酒波澜”：论黄侃词 附刘师培 ·····	407
第二章 以龙榆生为眉目的“彊村友生词群” ·····	419
第一节 “词坛尊宿，合继王朱”的夏敬观与冒广生 附诸宗元、何嘉 ·····	419
第二节 “泪洒人间授砚图”：论龙榆生及其词 附杨铁夫、汪精卫、 郑德涵 ·····	433
第三章 民国四大词人 ·····	451
第一节 “民国四大词人”辨说 ·····	451
第二节 “一代词宗”夏承焘与“天风阁词群” ·····	453
第三节 南中国士，岭海词宗：论詹安泰词·····	501
第四节 “我词非古亦非今”：论顾随词 附胡适、陈柱、曾今可 ·····	515
第四章 以学人为主干的民国词坛群星谱·····	547
第一节 唐圭璋与乔大壮、沈尹默等“雍园词群” 附《金鱼唱和词》、 马叙伦 ·····	547
第二节 刘永济与抗战词坛·····	574
第三节 “由来此事关襟抱”：论缪钺词 附庞俊、白敦仁、雷履平、 钟树梁、向迪琮·····	591
第四节 主持风雅的叶恭绰、郭则沄与“柯亭词人”蔡嵩云 附吴湖帆 ·····	609
主要参考文献·····	623
余论（代后记）·····	645



绪论 行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

——关于二十世纪词史的若干问题

一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二十世纪词史

本书所谓“晚清民国词史”乃是我所从事的《近百年词史》撰著的晚清民国部分。作为阐发基本理路的“绪论”，理应针对近百年词史——二十世纪词史——而发言。“二十世纪词史”能大体说清，则“晚清民国词”可以不证自明。

顾名思义，二十世纪词史即以1900—2000年这一百年为基准线的词创作史。它区别于已成热点的二十世纪词学史研究^①，也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现当代词史。近百年词史研究如何成为可能？或者说，如何获得属于它自身的理论支点？这是本书伊始必须面对的疑问，而且，这也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

我再三权衡，认为首先还是应该提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985年，北京大学两位青年教师钱理群、黄子平与博士生陈平原在《文学评论》联名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该年10月至翌年3月，三人又在《读书》接连进行了六期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对此概念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阐释，这就是著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三人谈”足以构成一次改变现代文学学术史走向的重量级事件，如陈平原夫子自道：“目前，这一尚未得到充分论证与阐发的概念，已被学界广泛使用，对‘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存在与发

^① 如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朱惠国、陈水云的诸多相关研究论著。

展，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但是，当我谈论‘走出’时，着眼点却是‘补天’，而非‘取而代之’。或者说，是站在本学科的立场，来反省面临的危机，以及可能的出路。”^① 陈思和则完全从正面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的提出，不但解放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也解放了研究者自身。”^②

若干年来，学界在反思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认识：文学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比照政治历史运程存在着相当的不同步性，故以朝代或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划界依据已呈现出严重不适应状态^③，但是由于约定俗成，也由于“朝代分期法”仍具相当合理性，故其目前仍是“性价比”最好的分界依据。相比之下，作为公元纪年法的“二十世纪”并不比朝代界限更能切合文学历史的实际，可是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学术概念，我们还是清晰地感受到一束探照灯光般雪亮的强光打在脸上。它照亮了此前现代文学研究不能、不愿、不屑去勘测的黑暗角落，也同时照亮了深度掘进的基本路向。二十几年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基本范型之一，而有关讨论也已成为推动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动力^④。

然而必须注意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文学”、“新文学”等概念一样，都存在着明显的“探照灯效应”，也就是说，它的探射范围虽较之其他有所拓展，但在阐释和认同中依然存在诸多黑暗区域，或

① 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5页。

②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韩文版），转引自全炯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第41页。

③ 如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文学开端，则明显切割了清代文学的整体性。早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区域性事件”的鸦片战争，并未对文学整体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其影响要到数十年后才会体现出来。可参见蒋寅主编《清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有关章节。

④ 《文艺理论研究》编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批判》编者按，《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第41页。又可见贺桂梅：《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第140—152页。



曰盲点^①。应该看到，这一概念是立足于新文学本位发言的，也即陈平原所说“站在本学科的立场”。当讨论到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这个“纵向的大背景”时，黄、陈、钱几位先生用了“断裂”这个关键词：“断裂正是一种深刻的联系，类似脐带的一种联系，而没有断裂，也就不成其为背景。”^②我无意否认“断裂”的判断，也无意否认“断裂是深刻的联系”的提法，但是同时也想指出，一味强调“断裂”，而忽视其严格意义上的“联系”，也即忽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仍在延续这样一个事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将不够完整，不能立体地、全景地呈现它应有的意涵^③。

在2007年发表的《“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一文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借用太史公的名言，就是要“通古今之变”，就是要穿透人为设置的诸多障碍，以贯通的学术眼光把握中国文学的整体流向。以古今散文之间关系为例，现代学术史其实已经有了比较多、比较成熟的讨论。远者如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朱维之《李卓吾与新文学》，近者如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张福贵、刘中树《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等，都精义迭见，提供了宽阔的思考空间。相形之下，古今诗歌之间递变传承的关系其实更见复

① 陈思和2006年6月22日在吉林大学的一次讲座“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曾用来比喻文学史研究的某些状况，与社会学概念所指不同。

②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第13页。

③ 此乃就其主流而言，现代文学界自有坚持“断裂说”的。如唐弢云：“现代文学史完全没有必要把旧体诗放在里面作一个部分来讲。”王富仁云：“我不同意（把旧体诗词）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文学地位。”但也自有不“断裂”的一种努力。姚雪垠即提出现代文学史该研究旧体诗词；钱理群主编过《二十世纪诗词注评》，并写有《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近年李遇春的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更是深度介入的明证。其他例子还有不少，可参见马大勇：《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第209—215页。

杂，更加重要，也更容易被漠视，从该命题的宏观到微观层面一直都缺乏足够的研究关注。其中，二十世纪的诗词（为区别于新诗/白话诗的创作，一般也称旧体诗词）创作应特别引起学界的注意。这不仅是一个蕴涵着巨大学术价值的“富矿”，更应该成为我们日形疲惫的中国诗歌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力点。

从一般的学术史视角来看，古典诗歌历经数千年沧桑，终于在白话文运动蔚为壮观之后归于沉寂。但是究其实质，古典诗歌乃是一座停止了喷发的火山，一条干涸了的旧河道，在火山内部仍涌动着炽热的岩浆，河道下面仍潜藏着澎湃的暗流。它默默地蓄积着极其汹涌的气派和能量，一旦处于某些特殊的历史节点，或与某些特殊的人物灵犀暗通，就会喷薄而出，回旋激荡，奏出或昂扬慷慨，或凄婉悱恻的异样音调和旋律。所以王仲镛说：“五四以后七十多年来，排斥者固已不遗余力，而好之者犹绵绵不绝，且日已寔富。”可是，这么重要的一部分诗歌创作数十年来却既被古代文学研究所冷淡，因为作者都是现当代人物；同时也被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所厌弃，因为那是“新人物”写的“旧东西”。于是，二十世纪诗词写作成了一段可以置诸无闻无见的“聋区”和“盲区”。但毋庸置疑的，它是现当代文学中不可淹没的客观存在，更是完整的诗歌史研究不可割裂的一脉珍贵泉源。^①

这段话并不针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概念展开论辩，然而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广泛认同为重新书写我们“此在”的这段文学历史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与坚稳的理论基石。“五四以后七十多年来，排斥者固已不遗余力，而好之者犹绵绵不绝，且日已寔富”，这既是很实在的、无法漠视的文学史景观，而且雄辩地说明：所谓“旧体”文学——尤其是诗词——在二十世纪仍然葆有强大的活性与能量。它与新诗、小说（包括武侠、言情、侦探等通俗小

^① 马大勇：《“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第199页。引用时略有改动。



说)、散文、戏剧联袂构建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共时性存在,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件。对此,我们不能死抱住高头讲章自欺欺人,更不应因某些偏颇拘墟之见一叶障目,而应该投入关切、花费精力去梳理之、推衍之,才能够真正、圆满地绘制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语境和场域^①。

那么,我们理应有“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史”的撰著,这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探照灯效应”的重要补充。由此,其分体样式——二十世纪词史也即获得充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由此我们或者还可以有更辽阔的联想。自新文学勃兴以来,我们众口一词,做出古典文学样式已经死亡的结论。即便是诸多卓有见识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也都自觉地把脚步停止在了二十世纪之初,并多方参与论证古典文学消亡的过程与原因。看来是大局底定、狂澜既倒了,可是,我们还是要问一句,会不会发布这个“死亡通知书”为时尚早呢?

这并非不识时务的无用之问,把目光投射到曼衍绵长的三千年诗歌史运程上,很多事实都会提醒我们,一种文类的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轨迹,过于简单草率的死亡判定常常会贻讥后人。我们知道,自唐初近体诗成熟以后,原有的“古典体式”——后来所谓“古体诗”——并没有消亡,而是与之齐头并进,成为古典诗体的两大范型之一;元曲盛行以后,原有的“古典体式”词虽在一段时间内江河日下,然一线元气未绝,历经元明两代数百年的衰微^②,最终在清代振翻怒飞,赢得“中兴”局面,其总体成就较之全盛时代非但无多逊色,甚且可凌驾而上之。那么在二十世纪,白话自由体新诗自发轫至今只有短短九十几年,仅大略

① 杨义先生说:“文学史不写通俗文学(同时不写旧体诗、现代戏曲之类),是很难复原现代中国文学丰富复杂的精神构成和文化生态的。文学之大,存在于文学之多,删除了多,又如何展示现代中国文化包容万象的博大胸襟和雄伟气象呢?”杨义:《中国新文学与现代中国精神谱系——〈中国新文学图志〉新序及小序》,《文艺争鸣》2008年第3期,第32页。

② 历来有“词亡于明”之说法,然而明词不乏可观,词学更大有胜境。可参见张仲谋《明词史》、《明代词学通论》等著作。

相当于唐初或清初的时间长度，我们又凭什么可以武断地说古典诗歌已经消亡，再无前途，而新诗自此可以一统天下，巍然高踞诗国坛坫呢？

我对新诗并无偏见，不仅涉笔写作，且多次在有关论述中为新诗张目，提出“不薄新诗爱旧诗”之说^①，这里只是想说，白话自由体诗歌的出现，只是古老诗国又一次平常的变异而已，从长远的视角来看，其结果或许只是又一次丰富了诗歌斑斓的色彩，而不是要对古典诗歌体式取而代之，扫荡一空。而我们也不妨摆脱掉文化激进主义那种不由分说的霸气，带着一种“平常心”来看待这次“平常”的变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一、二十二世纪中国文学的行程中，究竟是古典诗歌从此让位于新诗还是二者可以经过交锋，最终相视一笑、恩仇尽泯？抑或新诗无法继续繁荣，最终成了诗歌天空迅疾划过的流星？对此，我们似乎都还不忙下结论，时间在运行，历史在前进，最终我们总会找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

需要特别说明“二十世纪词史”的时限问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提到的“物理时间与文学史时间”之区别也同样适用于近百年词史。1900—2000年是物理时间，而文学史的发展当然无法依此截然割断。因而，百年词史的上下限应该也必须在此基础上有所延伸，即十九世纪最后若干年至二十一世纪初。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是：谁可以成为近百年词史的描述对象？刘梦芙先生《二十世纪中华词选》之编选说明取“十九世纪出生、1901年尚在世者，其作品皆入选”的标准，自“壮观百年词坛声色”之用意而言之，似不应有争议，然而有些情形还需作具体分析。例如该书第一卷开篇选入之谢章铤（1821—1904）、俞樾（1821—1907）、易佩绅（1826—1906）、张鸣珂（1829—1908）、谭献（1832—1901）、冯煦（1843—1927）等，晚年虽还介入某

^① 如马大勇：《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65—72页；《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第209—215页；等等。



些词学活动^①，然大抵已不填词。此类主要活跃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之词家，至文学史时间的二十世纪（含十九世纪末）已跨过词创作的“澎湃期”而进入“凝冻期”，似不应厕列“百年词史研究”课题范围，否则“二十世纪词史”之体量将过于庞大，同时也失去自足特质。有鉴于此，本书重点考虑“词人”身份成立之年限，大抵以“晚清四大词人”及其同时代作者为上限，行辈前此者皆从略^②。至于下限，因“百年词史研究”课题本身即延伸至今，故不成其为问题。

二 千年词史与百年词史

仅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出发还不足以辨认百年词史之来龙去脉，千年词史是其不可或缺的大背景。中国文学是一条绵延的长河，干流支派各成体系，各具层次，共同演进合构为纷繁多样的文学生态系统。如何辨认这条长河的主干与流向？被奉为圭臬的观点莫过于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一代”说最早可溯源至《易经》的通变观，历经金元明清数代学者之阐发，加之受到西方进化论以及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诸人学说的影响，最终定格于王国维之手^③。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史命题，最具权威、影响最广泛的中国文学史观，“一代说”自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然而历经一个世纪的“经典化”——极端化、曲解化——历程，其弊端也正在日益显现，正处于学界反思和扬弃的转捩点上。先师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说：“由于这一观念的不断地被推崇和延伸，简单化地从纵向发展上割断某

① 如谭献参与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寒碧词社，张鸣珂参与次年左运奎等发起的词社，冯煦参与光绪十九年（1893）至二十四年（1898）徐乃昌发起的《同声集》唱和等。

② 此一划界大抵取施议对先生《当代词综》之说法，又见其《历史的论定：二十世纪词学传人》，《词学》第二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217页。然而亦有个别例外如樊增祥等，详见后文。

③ 可参齐森华、刘召明、余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献疑》，《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5期，第43—49页；路海洋：《诗意光照下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第24—28页；等等。



一体沿革因变的持续性，又在横向网络中无视同一时代各类文学样式之间的不可替代性，终于导致原本丰富多彩、无与伦比的中国文学史变成一部若干断代文体史的异体凑合缝接之著……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架构任何定于‘一尊’的格局都是非科学的，其本身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史程实际。”^①齐森华等先生也呼吁：“正是这种片面性的引申，每每把一个时代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人为地单一化，把文学样式相蝉相承的演进轨迹机械地中断化，并进而把文学丰富多彩的发展历史线性化、平面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似乎已到了暂可悬置的时候了。”^②在201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下册）中，龚鹏程先生说得更直接：“一代有一代之胜的观点，重视的是历史中的变貌……这样论史，毋乃知变而不知常。因为唐代仍有古诗，不能仅注目其律绝；宋代诗体仍盛，不能仅重其词；元代尤不能重曲而轻诗词文章。可惜近世文学史偏要如此……此等忽略、漠视延续性文体而仅重其变异之眼光，岂不甚偏？”^③

对“一代”观的清算有利于我们重拾失落甚久的完整的文体流变意识。我们有必要回到文体本位，勘测探研每一种文体的源头、中游、下游，乃至干涸的过程与缘由。这是拥有完整的文体史意识的学者起码该思考的问题。举例来说，我自己是从清代诗词研究介入二十世纪诗词研究——通常所谓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在我眼中，二十世纪诗词是清代诗词顺理成章的自然延伸，并不存在一条“新”与“旧”的界河。我觉得需要追问，假如诗词这种流衍千年的文学体式没有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而消失，那么它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的？它在另外一种文化背景下具有何等样的意义和价值？它是否折射了自己所在时空的光影？是否撑起了作者的心灵境界？在艺术上比照前代的诗词写作有何变化和发展……显然，一大批这样的提问都需要谨慎作答，那么这一

① 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齐森华、刘召明、余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献疑》，《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5期，第48—49页。

③ 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下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版，第453页。

研究区域的存在就是既合理也合法的^①。

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千年词史进程中来观照近百年词史。发轫于唐，繁兴于宋，衰亡于元明，复振于清，作为中国韵文体式“晚生代”的词，也已经跨过千年风雨，画出了一道清晰的马鞍形流线。其中，自身成就极高而研究投入较低故而应获得密切关注的当数清代。在史家艳称为“中兴”的有清一代，词家多至一万之数，词作不少于二十万首^②，且名手林立，百派争流，诚可谓凌蹀唐宋，洋洋大观，令人生仰止之感。无论创作实绩抑或理论归结，都能集前代贤哲之大成而自辟户牖，为千年词史添加了醒目的惊叹号。清代之尾声即近百年词史之开端，二者承接递嬗关系之紧密不言而喻，故应予稍微详细的梳理。

清代二百六十余年的词史运程大体可分为初、中、晚三期。其初期实乃中国历史罕见的运会转移时代，伴随着颛顼昏暴的明王朝崩塌的还有汉民族的衣冠制度、文化传统，而伴随着生机勃勃的新朝崛起的还有“蛮夷”政权的暴戾心术。王纲解纽，新枝难栖，潜伏反抗暗流的智识群体更成为统治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在种种复杂因由的作用下，一向被目为“小道”、“诗余”的词终于从明代的一片榛莽中振翻而起，可庄可媚、亦庄亦媚，呈显出卓特多样的抒情功能，因而在整体意义上发展为与“诗”完全并立的抒情文类^③。从明清之际的云间、梅里、柳洲诸词群，广陵、江村、秋水轩几大唱和中发生的词风丕变，到阳羨、浙西两大流派的声响流布，笼盖词苑，以及今释澹归、王夫之、纳兰性德、顾贞观、曹贞吉等大家名家的卓然峭立，乃至傅世珪、刘榛、金人望、宋俊、何采、陆震等才人繁星丽天般的点缀，清初词苑上演了宋代以后最为璀璨磅礴的一幕大剧，而清词之“中兴”说也只有从抒情功能之复

^① 马大勇：《现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几个前提》，《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3日。

^② 此为严迪昌师编辑《全清词·顺康卷》时所估测之数据。根据目前《全清词》编纂工作的进行情况可以预见，《全清词》总数肯定大大超过二十万首，但究竟能达到怎样的数字尚无定论。

^③ 参见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